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研究综述

从1956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十年,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基本完成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开始转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十年,也是党在实践上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最初时期。这是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个关键时期。《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称这个时期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学术界常常把这十年同“文化大革命”十年相对应,称之为“文革前十年”,简称“前十年”。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前十年”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后出现过两次比较活跃的局面。

第一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大致延续至1988年,约10年时间。

就研究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看,这个阶段学术界对“前十年”的研究,可以说已涉及到了“前十年”历史的基本方面和绝大多数主要问题。其中,既有从宏观角度对“前十年”历史的总体研究,也有从微观角度对“前十年”许多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在宏观研究方面,从已发表的论著看,主要涉及对“前十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包括“前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地位,“前十年”历史的主线与党的指导方针的演变。“前十年”中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与失误,经验与教训,等等。在微观研究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对“前十年”许多具体历史事件和党的一些重要决策的逐一探讨与研究。从这个阶段发表的论著看,研究者论述较多的问题包括:八大的历史地位和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反右派斗争必要性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原因的评析,八届三中全会及其对八大路线的偏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研究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左”倾思想根源的探讨,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及其教训,60年代前期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八届十中全会及其后“左”倾错误的发展,等等。

总的来看,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前十年”研究的全面起步阶段。其重要特点,一是研究者紧紧围绕着《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开展了对“前十年”许多问题的深入的和多方面的阐述与探讨。例如,对“前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失误到底应如何看?为什么说成就是这个时期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又如,反右派斗争发生了严重扩大化错误,怎样理解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对这些问题,多数研究者经过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能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形成共识,坚持不同看法的仅是极少数。二是以《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为指导,对在“前十年”时期在“左”倾思想影响下所发生的事件重新进行反思与再认识。例如,对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的错误批判和随后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的研究与反思,对60年代初党内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对邓子恢等的错误批判的研究与反思等等。这些问题的专题研究既带有深入拨乱反正的性质,同时对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有着重要意义。此外,在这个阶段,有的研究者已开始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过程的高度,把“前十年”的探索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实践相比较地加以研究;有的还开始从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如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刘少奇、陈云等的经济思想等角度,探讨“前十年”中党的某些重大决策的由来与变化。这一切显示出对“前十年”的研究正日益走向深入。

第二阶段从1989年之后至1993年,约五年时间,这一阶段学术界以纪念建国40周年(1989)、建党70周年(1991)、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993)等重大活动为契机,出现了一个

以总结建国 40 多年来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为中心内容的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新的活跃局面。在这个活跃局面中，对“前十年”的研究仍然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并且取得了若干突破性进展。

这个阶段突出的特点是，不但主要党史刊物上发表的研究“前十年”的专题论文比前一阶段数量更多，研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更广更细，而且所出版的专著也明显增多。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论著，特别是薄一波同志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下卷的出版，对推动“前十年”研究的深入起着突出的作用。此外，在建党 70 周年前后出版的多种版本的论述中国共产党 70 年历史的著作中，都包括有对“前十年”的详略不同的论述。其中，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胡绳主编，经中央主管部门审批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在《历史决议》的基础上提供了一个研究“前十年”历史的基本思路，并在若干重要问题上有所发挥和深化，这无疑是本阶段对“前十年”研究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就研究内容看，这个阶段对“前十年”研究所取得的重要进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宏观上对“前十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的基本趋势的论述，可以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第七章，把“前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明确地概括为“在探索中曲折发展”，同时提出了“探索中的两个发展趋向”的论断，并对“两个发展趋向”作了符合历史实际的准确的阐述。应该指出，这一论断讲清了十年中党的指导方针的变化与曲折，从而也就有助于人们能更深刻地把握十年历史的基本脉络；这一论断为正确地评价十年中的许多重大事件，特别是正确地评价十年建设中的成就与失误，提供了一个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此外，这一论断还有助于说明“前十年”与“文革十年”的联系与区别：“前十年”中“左”的错误趋向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说明了二者的联系，而“前十年”中正确趋向毕竟在多数时间内占主导地位，这又说明了前后两个十年的重大区别。总之，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从宏观上认识“前十年”历史，的确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二，更加重视把“前十年”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比较地加以研究。一是许多论著比较注意从总结党长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历史经验的角度，以新的视角研究八大前后和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既评析其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又分析其历史局限性；二是不少论著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渊源的角度，深入研究“前十年”中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析了这些观点和主张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此外，在纪念毛泽东思想的相互关系问题，实质上也涉及对“前十年”的评析。所有这些进展表明，研究者开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重新审视党在“前十年”中的探索，说明研究的视野大大开阔，立脚点提高了。

第三，对“前十年”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积累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从多角度作了深入总结，取得了丰硕成果。突出的如薄一波同志所著《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从阶级斗争、经济建设、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党的建设等四个大的方面，总结了 13 条经验教训，可以说把在这方面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当然，学界对“前十年”的研究也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从研究的内容看，总的进展很不平衡，有许多问题还研究得很不够。例如，从已发表的专题论文看，研究“前十年”前期和中期问题的较多，研究 1962 年八届十中全会及其之后问题的就显得很少。又如，到目前为止，围绕着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败得失的研究较多，这当然是对的；但对其他方面，如对这个时期的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外交工作、文化教育工作，以至军事工作和国防建设等等的研究，则相对显得很不够。还有的问题，至今仍然很少涉及，如对

这个时期的中苏论争及其对我党国内政策的影响的评析，等等。从研究方法看，如何把宏观与微观的研究相结合，以宏观研究成果指导微观研究深入，如何在“前十年”研究中更多更自觉地吸取哲学、文化和经济等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这都是今后需要进一步努力提高的。

二

学术界对“前十年”的宏观研究，中心是围绕着对“前十年”历史的总体评价展开的，涉及较多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一是对“前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的历史地位及其成就与失误的总体估计，二是关于“前十年”历史的基本脉络和党的指导方针的演变，三是“前十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经验教训。

（一）历史地位及其成就与失误

这是对“前十年”历史总体评价中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历史决议》把这十年概括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并明确指出，在这十年中，“我们虽然遭到严重挫折，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邓小平在谈到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时，也曾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①这些论断，为正确评估“前十年”历史指明了根本的方向。

迄今为止，党史界对“前十年”历史地位的研究，一般是从两个角度展开的。一是从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全过程的角度来评价“前十年”的历史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有的研究者明确提出，要把这十年历史“放在建国以来四个时期。三十多年的历史过程中来考察”，“放在当时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大背景下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指出这十年的历史，是在“既要突破苏联模式”、“探索走新路”，“又没有吃透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情况下，摸索前进的历史”，因此，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特点，它是社会主义发展前进中的一个阶梯。”^②有的研究者指出这十年“是我党独立自主地寻求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十年，是一个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过程。”^③

二是从“前十年”本身的历史特点出发，考察其在党的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有的研究者指出这个时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时间之长，事情之多，内容之丰富，在党六十余年众多的历史时期中，是比较突出的时期之一”；其二，“这是一个党的领导由上一个时期正确到下个时期发生根本性错误的中间变化期，呈现着特有的性。正确与错误交织，成就与失误并存，经验与教训特别多而深刻。”因此，对这个时期的研究，“对于认识‘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对于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史性的转变，乃至对迄今为止整个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认识，都有重要价值。”^④有的研究者则从三个方面评价“前十年”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所具有的特殊历史地位，指出这十年的历史，“是党的工作指导方针曲折发展的历史；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各条战线上进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也是党独立自主地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取得正反两个方面丰富经验的历史”。因此，如何正确评价这十年历史，“是关系到能否正确地对待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⑤

^① 《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第266页。

^② 丛讲：《谈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研究》，河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260—264页。

^③ 张弓：《建国后前十七年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177页。

^④ 丛讲：《谈谈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历史的研究》，《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254页。

^⑤ 陈雪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历史概貌及其地位》，《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352页。

对于“前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失误到底应如何评述的。第一，从这十年党的工作指导方针看，有的研究指出，“十年中的一小部分时间里。党的工作有过严重的失误，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党的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或者是在大力地纠正错误。因此，就十年的全过程和全局来看，应该说成就还是主导的方面。”^①有的研究者在具体分析了十年中党的指导方针的变化后的指出，综观这十年，大部分时间里党的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中间发生的错误后来在实践中又有相当的纠正，因此，“对这个时期理应基本肯定而不应基本否定。”^②第二，从这十年取得的成就看，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是依据《历史决议》的精神，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物质技术基础的初步奠定、人材的培养和党的领导经验的积累等三个方面论述了十年建设中的成就。其中，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不但以大量准确的统计数据，比较全面回答了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建设和科技、教育等方面的重大发展，丰富了《历史决议》的论断，而且在指出“大跃进”给十年建设所造成的严重消极后果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大跃进”期间并非是一无所获。该书指出：‘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据统计，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建国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扎实的成果。”^③这种对历史事件采取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而得出的认识，反映了研究的深入。第三，从十年中成就与失误的相互比办看，多数研究者的共识是成就大于失误。有的研究者指出，这十年中，“有时错误虽然发展的很严重，并使党和国家遭到严重损失，但总起来看，还没有达到掩盖成就的地步，因而它还不占主导地位。”^④还有的研究者指出，这十年中，“就一件件事情看，错误是比较严重的，应深以为戒；从十年总体上看，作为总估价，其分量还是低于正确和成就方面”，“因为，社会主义事业在十年中毕竟地发展前进了，这是这个时期最基本的事实。”^⑤

对第二个问题即如何看“前十年”失误的问题，研究者总是提出对失误要作具体分析，认为“这一段错误是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失误，它无论在性质上、在时间上和范围上都还不同于‘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严重错误。”^⑥

对“前十年”所犯错误的内容，研究者一般都归纳为两个大的方面，涉及若干具体历史事件。即在经济建设方面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突出的事件是“大跃进”的严重失误；在阶级斗争方面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反右斗争扩大化、庐山会议“反右倾”，八届十中全会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升级及随之而来在社教运动中和文化批域中的过火批判等。研究者对上述错误的性质、程度及其严重影响等等都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其中，有的研究者提出了要认识这个阶段错误发展的曲折性和反复性的观点。指出：“这十年我们犯错误有一个特点，就是曲折性反复性比较大。总的情况是，犯了错误，发现行不通，就有所纠正，还不是一错到底，‘十年一贯制’。但由于不可能从指导思想解决问题，这就决定了当时纠正错误不会彻底，因而曾经出现犯错误——纠正错误——又犯类似错误这种曲折反复现象。”同时研究者又特别指出，“在经济建设方面，居于主导的还是在不断发现和不断改正

页。

^①张弓：《关于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教学和几个问题》，《教学与研究》编辑部编辑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12页。

^②丛讲：《怎样理解成就是“前十年”的主导方面》，《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③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2页。

^④张弓：《关于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教学和几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12页。

^⑤丛讲：《怎样理解成就是“前十年”的主导方面》，《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

^⑥陈诗惠：《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第542页。

错误，这种曲折还是一种螺旋式的向上发展。”^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从历史教训与现实经验相结合的角度，以其理论分析的全面性和准确性，把对“前十年”所犯错误的认识大大地提高了一步。该书强调前十年所犯错误往往由真理越过了界限而来，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速度问题上，力争现实可能的、讲求效益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较高速度，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越过这个界限，追求主观臆想的、盲目冒进的高速度，那就是错误的，并且带来了严重破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上，重视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的阶级斗争，警惕和平演变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这本来是必需的和正确的。看不到这种斗争和危险，是十分错误的。越过真理的界限，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甚至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和平演变的形势作出不符合当时当地实际的夸大估计，把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当作‘修正主义’来反对，那就是错误的和极其有害的了。”^②

此外，研究者还对“前十年”所犯错误的原因及其责任进行了分析。其中，在对犯错误原因的分析中，研究者较多地论及缺乏经验的问题，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它正在实践中发展，确实存在一个经验不足的问题。有的研究者从六个方面归纳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经验不足，“即：1. 当时我们确实缺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面或反面的实践经验；2. 党也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特别是有关基本经济规律的知识；3. 对我国国情的分析研究也不足；4. 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缺乏参考和借鉴；5. 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更不屑去学；6. 对前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已有经验，缺乏一分为二的分析和重视等”^③有的研究者则进一步指出：“一方面，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知之不多，特别是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长期性、特殊性认识不足。但另一方面，许多同志又有着搞大规模群众运动和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的长期经验，容易自觉不自觉地用这种只适合于过去任务和环境的经验来设想、看待以至处理经济建设中的复杂问题。……这种狭隘的经验，加上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离开了现实的可能性，违背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不可避免要办蠢事、犯错误。”^④

（二）基本脉络和党的指导方针的演变

这是“前十年”宏观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也是迄今为止“前十年”宏观研究中进展最为显著的一个方面。

《历史决议》公布后不久，党史研究中对“前十年”党的方针的变化，就曾经提出过两种较有影响的说法。一种是有的研究者把“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概括为六次较大变化，另一种是更多的研究者把“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的曲折变化概括为三个阶段。

所谓党的方针的“六次变化”，即是指：第一次在八大前后，党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这是“党在战略部署上的重大转变”；第二次是反右派斗争之后不久改变八大的方针，一方面是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经济建设上以急躁冒进取代八大确定的稳步前进方针，出现“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第三次是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的纠“左”努力，表明“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实际上正由急躁冒进向稳步前进的方向转变”，但当时“没有把问题明确地提到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检查，没有公开地提出反‘左’口号”；第四次是庐山会议“反右倾”，中断了纠“左”进程，不但把阶级斗争引进党内，进一步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也使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再度盛行起来，使国民经济陷入更加严重困难的局面；第五次是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努力纠正和克服“大跃进”中的

^①陈诗惠：《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第543页。

^②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5页。

^③张弓：《关于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史教学和几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22页。

^④陈诗惠：《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再认识》，《中共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选》第546页。

许多“左”倾错误，同时在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也作了若干政策调整；第六次是开始于八届十中全会前后，主要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①。

所谓党的方针曲折变化的“三个阶段”，是指：八大之后，1957年为第一阶段，这一段总的说是执行了八大的正确方针，社会主义建设在实践上和理论探索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有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至1960年为第二阶段，这一段党的方针偏离了八大路线，出现了严重失误，主要是犯了“大跃进”的全局性错误，其间虽曾努力纠正过已经觉察到的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但由于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根本解决问题，因此庐山会议“反右倾”之后，“左”倾错误再度发展，而且比1958年更严重；1961年至1966年春为第三阶段，就全局而言，这一段党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一系列正确政策，“领导思想在一些重要方面（不是一切方面）重新走上了比较符合实际或逐步接近实际的轨道”，使国民经济相继出现好转和全面好转的局面，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只是这个阶段的后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部分领域又继续发展，当时虽未达到支配全局的地步，但它的恶性发展却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②。应该指出，这里所概括的党的方针曲折变化的“三个阶段”，实际上就勾画了“前十年”历史的基本脉络。

十多年来，对“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的研究，其突出的特点是研究者紧紧地围绕着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一主线，着重就探索中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和速度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问题等等，分析了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前后变化，并就这种变化的利弊得失，正确或失误，力求作出实事求是的、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估。其中，对这个时期党在实际工作重心转移问题上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的研究，则更为深入和明晰。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后，如何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是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这也是关系到党的指导方针是否正确的问题。研究者对“前十年”中党在这个问题上指导思想的变化，作出了较为系统的论析。

首先，极大多数研究者都高度评价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和全国人民主要任务的论断，其中，有的研究者明确地指出八大的这一科学论断，“在实际上提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从社会主义改造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这是党在新时期总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③《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则进一步指出八大论断的着眼点，是“在于把我国生产力发展还很落后这一基本国情突出出来，强调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全党要集中力量去发展生产力。这个着眼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④

其次，研究者又明确地指出，在反右派斗争之后，由于党和毛泽东“重新把阶级斗争提到首位，造成了很长时间内未能很好地完成工作重点转移的严重后果。”^⑤薄一波在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也指出：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严重后果，“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就是修改了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从而中断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使我们

^①参见周承恩：《试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方针》，《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

^②参见裴棣：《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指导方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34-150页；另参见陈雪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概貌及其地位》，《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352页。

^③参见周承恩：《试论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指导方针》，《教学与研究》1982年第3期。

^④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35页。

^⑤参见裴棣：《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指导方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36页。

党和国家长期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阶级斗争连续不断并逐步升级，严重地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错过了不少宝贵的发展时机，影响了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①有的研究者则进一步从指导思想的角度，把1957年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左”倾错误的发展概括为“四次升级”，即：第一次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导致对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提法的更改；第二次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混淆阶级斗争与党内意见分歧的区别，把阶级斗争引向党内；第三次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并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从而完成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第四次是1964到1965年间，在社教运动中提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指导思想，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升级，也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哨战^②。

当然，研究者也指出，1957年以后党也并非完全停止了实现工作重心转移的努力。许多研究者都肯定，1958年初毛泽东提出要“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同八大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就肯定：“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③但是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一方面说党的工作重点是生产建设，一方面又说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这就使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都陷入了自相矛盾的状态。”^④而这种状况不能不妨碍党实现工作重心的转移。

研究者还探析了“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几次变化的原因，尤其对八大之后党的方针急剧变化的原因论述得更多更深入一些。有的研究者指出，八大仅仅开过一年多，党就偏离八大路线，在指导方针上发生急剧变化，“这在客观上是由于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缺乏经验，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主观上的原因是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以及个人专断的发展和民主集中制的削弱。”^⑤应该说，这样的分析现在已为多数研究者所接受。同时，不少研究者还进一步从八大本身的局限性来论述八大路线未能坚持的原因^⑥，有的研究者指出：“八大虽然提出了正确的路线，但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如何向前发展，思想、理论准备还是不足的；虽然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方针，但也没有具体化。所以八大没有能够防止后来‘左’倾错误的不断发展，更没有能够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灾难。”^⑦也有的研究者不同意用八大的“历史局限性”来说明偏离八大路线的原因，认为“中共八大在当时的条件下作出了它所能作出的最大贡献，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因此，“要正确指出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的原因，必须从广泛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作出实际的考察与分析。”这位研究者并试图从八大路线制定的历史背景和“对这一路线的正确性缺乏深刻的认识”，从“毛泽东对八大路线存有疑议”，从“传统思维方式、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惯性冲击力”，从“客观形势的变化以及对客观形势变化的

^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3页。

^②参见张亦民：《毛泽东反修防修思想的由来和发展》，《党史研究资料》1986年第1、2期。

^③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58页。

^④参见裴棣：《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指导方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39-140页。

^⑤参见裴棣：《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中的指导方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教学研究》第141页。

^⑥参见张弓：《八大的历史意义及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年第1期；孙力：《也谈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党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⑦陈雪薇：《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历史概貌及其地位》，《怎样研究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第359-360页。

错误估计”等几个方面，对八大路线未能坚持的原因作了分析^①。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历史决议》公布十年之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其第七章在总结“前十年”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时，提出了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的新论断，即“一个发展趋向是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积累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实践经验。”“另一个发展趋向是错误的趋向，这就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形成的一些错误的理论观点、政策思想和实践经验。”这是对“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发展变化的一种新概括。值得注意的是，该书在列出这两种发展趋向的具体表现的同时，还明确地指出了十年探索中两个发展趋向并存的特点，即“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许多时候都是相互渗透和交织的，不但共存于全党的共同探索过程中，而且往往共存于同一个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在全党有时这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有时那种趋向比较占上风，或者不同趋向在不同领域同时并存。”^②揭示这个特点的意义在于，它不但比较准确地表述了“前十年”时期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指导思想上的实际状况及其发展趋向，而且它不同于过去那种把党内不同认识归结为不同的人代表了不同的路线的传统的“路线分析法”，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这个时期全党在共同探索中的成就与失误。这种新概括既符合《历史决议》的基本精神，又是在《历史决议》基础上的一种深化和发挥，从而把对“前十年”党的指导方针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水平。

（三）基本经验教训

“前十年”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积累了极其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正确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不但是“前十年”党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指导我们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宝贵精神财富。1987年邓小平就曾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在总结了成功时期的经验、失败时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时期的经验后制定的。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进行全面拨乱反正和推进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曾反复地不断地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包括“前十年”在内的二十年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总结，并用以教育全党。15年来，党史界对“前十年”历史经验的研究，与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全面拨乱反正相结合，特别是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逐步深化并不断取得进展。

首先是《历史决议》公布后不久，在学习决议的基础上，研究者以“着眼于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再认识”为特点，对“前十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在这种“反思”和“再认识”中，从多方面初步总结了“前十年”的基本经验。例如有的研究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前十年”探索中的基本经验教训：1. 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一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是对历史经验所作的高度概括，是我们多年来付出了巨大代价才领悟到的一条最基本的科学社会主义原理。”2. 强调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要从国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在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就是离开了我国国情，超越了实际可能性。”3. 指出十年中发生的曲折对我们最大的教益就是要端正思想路线，谨防头脑发热，要永远记住“实事求是”四个大字。4. 处理阶级斗争问题一定要正确估量形势，采

^①张星星：《中共八大路线未能坚持下去的原因》，《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5期。

^②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405-406页。

^③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4-235页。

取谨慎的方针^①。这些分析，反映了多数研究者在学习历史决议基础上所形成的共识，也反映了当时的研究水平。

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特别是随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逐步形成和人民对这一理论认识的日益深化，在党史研究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就愈益深入与清晰。1993年6月出版的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作出了比较系统的概括，集中地反映了对“前十年”历史经验研究的新成果与新水平。该书第四十三篇以一个整篇的篇幅，从阶级斗争、经济建设、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党的建设等四个方面，总结了“前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所积累的13条经验与教训^②。这个总结，不但内容全面，而且其显著特点是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成败得失，评述公允，立论可信，并体现了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内在联系与发展。例如，该书总结“前十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只能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探索中前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始终应该保持有效的宏观调节”；“确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经济决策不可盲目跟着政治风向跑”等论断，就是历史经验与今天的认识的结晶。又如，该书着重根据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失误，指出“前十年”党在处理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变革方面，“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年犯错误的根本症结所在”；“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要和水平，不停顿地去变革生产关系，这是当年犯错误又一症结所在”；“真正认清平均主义的危害，从思想上划清社会主义和平均主义的界限，是我们吸取农村人民公社化教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些都反映了，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新审视历史后的新的认识水平。

1993年10月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南，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根本依据。《文选》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中，以下三点对研究1958—1978年二十年历史经验，具有更加突出的意义：一是从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所应遵循的根本原则。邓小平指出：“二十年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条最重要的原则：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③又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二是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和根本任务的角度，总结了二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教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从这一点出发，他强调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⑤。三是从社会主义建设根本指导方针上，总结了二十年所犯错误的主要特点是“左”的干扰。邓小平反复指出，“从一九五七年开始我们的主要错误是‘左’，‘文化大革命’是极左。”^⑥“‘左’的思想发展导致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是比较大的错误，使我们受到惩罚。……以后就搞了

^①参见陈诗惠：《对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的再认识》，《中央党史研究优秀论文集》第546-548页。

^②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23、658、1257-1296页。

^③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

^④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⑤邓小平：《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⑥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

‘文化大革命’，走到了‘左’的极端，极左思潮泛滥。”^①正是由于“左”的干扰，“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这些深刻论述，精辟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它也必将推动对包括“前十年”在内的历史经验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杨先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研究综述》，载《教学与研究》1994年第6期、1995年第1期。
2. 何仲山、姚小玲：《“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史研究综述》，载《北京党史》2001年第2期。

^①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137页。

^②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7页。